

## 作为现代知识分子自我分析案例的《多余的话》

沈 巍

《多余的话》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奇特的文本，文章写于作者“灭绝的前夜”，也是最后一次自我表白的机会。这时候，作者瞿秋白不仅被俘、被“解除了武装”，同时在组织和归属上也感到被拉出了革命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所以文章写作的原初动力是一种“冲动和需要”——“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布尔乔亚智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这不仅说明作者到生命最后一刻的自我定位是“小布尔乔亚智识者”，同时也提示了他所面临的困境：“自我分析”以及由此产生的怀疑畏缩，是他政治生涯中的最大悲剧；同时瞿秋白的分析还意味着，知识分子（不论其经济地位多低）总是具有先天的小布尔乔亚属性，要想真正融入革命潮流，必须依靠时时刻刻的“自我分析”，以期实现自我改造，这使自我意识以及自我定位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先天宿命，直到建国后，“改造”的过程依然没有完成。本文希望通过分析这个文本及其在历史中的关联，寻找现代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形成与消解过程，以及自我感在历史情境中的独特传达方式。

### 一、群众运动中的自我感

#### 1、理想“知识阶级”的缺位

《多余的话》用悲哀沮丧的口吻将作者的身份定位为“文人”、“书生”，也就是知识阶级（有时用“智识阶级”，意思相同），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特性：

- a. 貌似渊博，实则没有一技之长，于社会毫无贡献，是一种“高等游民”。
- b. 从性格上看，怯懦平庸，没有见解，也没有为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
- c. 从知识结构上看，对新旧都有涉猎，也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但一切知识只是“消闲的工具”，因而不能形成坚定的信仰。
- d. 热爱“体面”，在生活趣味上追求光鲜安逸，在社会潮流中也往往趋新，因此才加入到革命阵营中。

基于以上分析，瞿秋白认为自己这类“文人”是与现代革命风潮完全相悖的“中世纪的残余”、“很坏的遗产”，应该逐渐消灭掉。从他对以自身为范本的知识阶级的剖析中，可以看出一个深刻的矛盾：中国思想启蒙与现代革命的起点始于由知识阶级发动的五四运动，这在当时已是共识，在后来的革命中始终伴随着知识分子的领导与加入，革命无法摆脱知识分子，也无法实现理论中所说的由真正的“无产阶级”来领导；

然而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却是源于骨子里热衷于体面、新潮的劣根性，同时对革命又充满了各种浪漫色彩和个人英雄主义的幻想，与此相应的则是浮夸的作风、不切实际的判断以及面对问题时的妥协动摇。因而这批貌似“进步”的人在革命进程中常常起“反动”作用，除非进行彻底的自我改造。在瞿秋白自身的历程中是充满这种改造自觉的，正因如此他始终感到自己是“戏子”，“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角色扮演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与所扮演的人物合而为一，而瞿秋白在政治生涯的最后感到抹去油彩的轻松，恰说明知识阶级灵魂改造的失败。换言之，中国革命一直在呼唤并塑造一种没有知识阶级劣根性的理想“知识阶级”，对这样一种人在哪里，是否可能存在，则没有答案。

## 2、 从社会到阶级社会

作为革命理论家的瞿秋白最经常追问的是“我”是谁，“我们”是谁，他对自己在环境中的位置异常敏感，也很熟悉自己阶层的思维方式。《多余的话》处处体现着作者作为文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卑感，这种感觉是面对一个广阔的阶级社会和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时才产生的。然而，关于“无产阶级”的存在形式，也始终是一个令瞿秋白始困惑的问题。

不止瞿秋白如此，20年代很多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阶级状况作出的判断，都认为在当时中国，缺乏理论中那种有组织、有觉悟的理想的工人阶级，也因此无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比如陈独秀主张先实现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梁漱溟自建国后一直在反省自己对中国革命判断的失误，认为失误的关键在于“过分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之所以“特殊”，也就在于“秦汉后的中国，是融国家于社会的，它没有构成阶级统治”，因而也没有革命；基于这种判断，梁漱溟认为中国自1911年完成了政权从帝王向现代政党的交割之后，剩下的主要问题是重建秩序，整个民国时期他都着眼于社会与民众。

从事渐进的社会改良，也是瞿秋白最初的政治理想，如果他确实有政治理想的话。在《多余的话》中，作者称自己没有“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只是想“找一种学问或文艺研究一下”，也就是走专业知识分子之路。事实上，瞿秋白是五四时代崭露头角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比较早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考察的人，他的这种整体社会意识正是从对知识阶级独特性的关注上来的。当时他与瞿菊农、郑振铎、耿济之等人办《新社会》旬刊，是一种初步的“社会主义的讨论”，这时他所关注的话题：劳动问题、普及教育、新村运动、文化运动、革新家庭伦理，等等，都是当时文化界热衷于讨论的，很快被认为是“过激派”、“布尔塞维克”，被警厅封闭，后来组织《人道》月刊，是“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sup>1</sup>

这时候在政治理论上吸引瞿秋白的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的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

1 瞿秋白：《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一）》，页26—27。

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级（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

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手段”改造当时的中国社会，是瞿秋白以后的政治生涯中面临的最痛苦的问题。理论无法直接用来指导现实，瞿秋白在赴俄考察期间就已经注意到了。1921年，他学习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感到“俄罗斯东方式而西方的国民性和马克思急激的彻底的预言式的学说混合起来而形成现时的政治状态”。<sup>2</sup> 瞿秋白特别关注作为“共产主义人间化”第一个样本的苏维埃俄国内部的阶级结构，“人间化”的核心理念是“无产阶级独裁制”，这在俄国已经实行了，但据瞿秋白的观察，俄国农民多，工人少，“真正的无产阶级很少很少，程度又浅”，真正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反而是农民“趋于无政府的国民性”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质朴、蛮荒的力量。“于是不得已，事实上只能由‘主张无产阶级独裁者’来执行独裁制”，也就是一种“贤人政治”，所谓“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指导群众”。<sup>3</sup>

面对中国现实，“真正的无产阶级”所占比例比俄国更小，对瞿秋白来说，“预言式的”理想学说转变成现实社会的阶级斗争是勉为其难的，他必须面对阶级分析，也不得“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直到最后瞿秋白并没有对阶级理论抱任何微词，只是说“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到了更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断，而我的那点智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对阶级问题发生困惑的结果是“想不通，甚至不想动了”，所以《多余的话》称作者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因为作者已“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不再思索，也就不再怀疑。

### 3、“自我”迷失于群众之中

如果说在社会改良运动中知识阶级还可以担当主力，那么在阶级斗争理论中，知识阶级只能位居从属了，而且知识阶级内部成分也非常复杂。1923年瞿秋白曾把知识阶级分为新旧两个阵营，旧的是革命的反对力量，新的是革命思想的倡导者，当时正是社会对新智识阶级的中坚力量——学生界的能力大加赞扬的时候，当时的瞿秋白就得出结论：“智识阶级只是社会的喉舌，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sup>4</sup> 那么，如何与主体相关联在革命中发挥作用，就成了智识阶级的首要任务，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智识阶级在革命中的定位，以及如何安置自身的阶级属性，一直是作者讨论和建构的重要问题。

2 瞿秋白：《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一）》，页224。

3 瞿秋白：《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一）》，页226—229。

4 瞿秋白：《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二）》，页4。

《多余的话》没有一言质疑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真实性，却婉转地透露了另一层意思，即自己在党内常年担任理论宣传工作，最后身心俱疲，却触摸不到现实的脉搏。所以当生命将尽的时候，“很想仔细的亲切的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

这“实际生活的味道”大致有两层含义，一是亲自考察一些诸如土地革命后农民私人日常生活有了怎样的变化这类具体问题，虽然从以往经验来看，作者感到自己一开口就没有共同语言，以致终于一无所得，恐怕很难深入这类问题之中；二是认真做一些俄文名著的翻译，从中体味一些人物形象的深刻和丰富。

从这时瞿秋白的自述中，他的政治生涯只是在理论政策的裹挟之中，这与知识分子的浮妄虚夸正好相辅相成，他急欲摆脱空洞的理论做一些具体实在的事情，虽然都已经“太迟了”。这其中，文学虽然是理想的精神家园，但因其昭示着与政治相对立的两种趣味，“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革命阵营中的瞿秋白一直难以表达自己对的文艺真实态度，自己一身文艺气质却只能发布“来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文艺复兴运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式的纲领，<sup>5</sup>反复强调文艺的政治功用，将自己纳入革命队伍中，避免成为被抛弃的人，这也是当时很多文学青年的宿命。而走入群众生活、加入群众运动则一直是瞿秋白认为可以摆脱阶级原罪的救赎之路。

瞿秋白的自我感正是在平生遭遇的第一次大规模群众运动中被激发的。五四运动让他突然摆脱了消极厌世的精神状态，“孤寂的生活”打破了，瞿秋白和他周围的同学“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并且信仰克鲁泡特金所说“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sup>6</sup>但群众运动带来的热情不能持久，到1920年学生组织开始分化，不复从前的单纯和活力，也正是在这时瞿秋白开始思考群众运动的问题，他接触到法国思想家吕邦（Gustave Lebon）的群众心理学说，看到了群众运动的特点，那就是个体意识和个性的消失，以及集体无意识的相互感染，从某种程度上说，群众运动正是人们潜意识中恶劣的一面经激发集体发作的结果。事实上吕邦本人就是站在精英立场上面对业已到来的群氓时代表达深刻忧虑的，瞿秋白此时的思想状况与吕邦很像，他看到了五四运动中学生们取得的主要成就是以一时的义愤去感动群众，激发群众的热情，并没有真正深入群众心理，效果也难以持久，瞿秋白希望能产生一种超越群众运动之上的“社会运动”，后者必须抛弃极端的感情，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受外在暗示，一步步研究社会并加以改造。群众运动中的牺牲者往往是被强烈情绪所鼓动，被暗示或轻信而去牺牲，实际上是对自我的放弃，而社会运动的牺牲者首先要保持积极的怀疑心和独立的人格，是一种健全、理智的改造社会的主体。<sup>7</sup>很显然，瞿秋白有志于成为这类保持自我的“社会运动的牺牲者”，然而在介入政治越来越深的过程中，那种保持清醒自我的理想也离他越来越远了。

5 瞿秋白：《论中国文学革命》（香港：海洋书店，1949年），页103。

6 瞿秋白：《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一）》，页25—26。

7 瞿秋白：《社会运动的牺牲者》，《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一）》，页51—55。

## 二、对市侩属性的克服与失败

瞿秋白自陈出生于世代读书、世代做官的绅士阶级，天生的绅士意识，加上小资产阶级或市侩意识，一直与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人生观相对抗，直到最后，后者也没有取得胜利，形成了一种“二元化的人格”。中国传统的绅士意识能够天然地与小资产阶级或市侩意识相结合，并且构成了瞿秋白自我定位系统中的重要地图。

### 1、对市侩知识分子的批判与认同。

瞿秋白对小资产阶级或市侩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来自旅俄经历和对俄国文学的研究。20世纪正是小资产阶级价值观兴起和蔓延的时代，在苏俄革命过程中，对小资产阶级的批判和清算始终是个重要的理论和策略问题，同时俄国文学史上又有一系列丰满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一方面瞿秋白在这一群体身上发现了自身的许多属性，比如，没落贵族出身，英雄情结，对崇高理想的热望，也看到了这批人身上不可救药的虚荣和利己，在瞿秋白眼中，这批人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普遍精神状态，他的自我认知与自我改造也经常是以此为参照系的。在《多余的话》中，他坦然承认，自己一直在压抑身上本有的小资产阶级情感，用后来学到的马克思主义来创造一种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但一直非常勉强，这也是现代知识人一种普遍的处境和悲剧。

### 2、市侩价值的改造与激进行动的生成

瞿秋白曾将当时非常流行的实验主义作为市侩心理的主要体现加以批判，同理，一切多元论和改良派的思想也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市侩性，这是中国现代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思想相对立的一支主流。事实上瞿秋白在五四时代创办《新社会》的时候也是持温和改良论的，并在发刊词中说“我们的改造的目的和手段就是：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达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对实验主义和渐进改良派的批评是瞿秋白自我改造的重要一环，也是建立新的革命哲学的基础。直到国民革命的失败，暴力革命带来的血腥恐怖凸现，以及革命面临重新寻找主体的时候，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面临自我改造的破产与自我的重新定位问题。

### 3、现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躯体化历程

“躯体化”是美国社会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使用过的概念，用以表达人类疾病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不可取消的关系以及环境对个体的影响。在他的《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一书中，“躯体化”专指“有关身体不适和求医问药的习惯用语中的那些关于个体以及社会苦痛的标准化表达”。<sup>8</sup>在躯体化理论中，疾病不仅体现为临床病理反应，人们对疾病的感受也往往关联着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历史经验。

8 (美)凯博文著、郭金华译：《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上海三连书店，2008年），页2。

对身体状况和病痛的描述为病人提供了一种对个体经历的去道德化的解释模型，这时候，许多受环境压抑无法得到表述的心灵状态能够得以传达。如书中所说：“身体体验的现象学也是理解自我的一个基本条件。……从身体的角度看社会世界，就是要对那些形塑个体和群体生活的强有力的过程进行研究，用福柯（1978）的话来说，就是要研究组织我们的生活世界的社会力量是如何渗透进（以及压迫）我们最私密的个人体验的。”<sup>9</sup> 躯体化理论对于历史人物个案研究的启示在于，可以帮助我们透过人物的自我剖析，捕捉到与个体感觉相关联的时代信息，复原那种带着历史印记的身体感觉。

瞿秋白就是一个具有敏锐身体感觉的人，并将这种感觉贯彻到自我分析和对历史的解释之中。在他的政治生涯中，马克思主义很多时候是一种必须用理智把握的异己，成功的自我改造是要用它来“创造新的感情，新的感觉方法”，但这种努力“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

对这种不成功的自我改造，瞿秋白最常用的表达方式是“脆弱”，后来脆弱也经常用来形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大体意思是无法承担艰巨任务，另一方面也含有尚须锤炼与继续改造的意思。《多余的话》两次发出这样的感叹：

“我是多么脆弱，多么不禁磨练呵！”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干吗？！”

“脆弱”当然有体质上的原因。在很多人的回忆中，瞿秋白是以体弱多病的书生形象出现的，消瘦、病容、苍白是人们对瞿秋白外型上的主要印象。《多余的话》也用大量篇幅陈述自己的病情，可以看出，致命的肺结核发作开始吐血的时候，正是瞿秋白政治生命开始的五四运动，病症伴随瞿秋白的整个历程，不断提供疲劳、疲惫、重压、倦怠等身体感觉，使人最终变成“废人”、“废物”。

对比20年代瞿秋白对身体改造的表述是非常有趣的。五四运动时期，瞿秋白认为知识阶级特征是不劳而食，或者对这种生活方式的向往，这也是其劣根性所在。当时瞿秋白的言论中对资产阶级趣味非常反感，对闲适生活有种特别的厌恶。应该说从那时起，瞿秋白就有一种担心自己是“废物”的恐惧，为此他大声疾呼“救我们的只有劳动！”这里的劳动意味着下层阶级的体力劳动。他曾信仰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也就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同时进行以实现充沛的生命价值。五四以后，知识群体中风起云涌的工学组织、工读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精神状态的普遍性。

从对变成“废物”的恐惧到承认自己确实是“废物”，这一变化是在革命过程中完成。“报废”的比喻一方面对应着“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自我解嘲，换言之，“文人”的普遍状态正和“废物”一样，沉潜遨游于某一专业领域之内，这里“废”的含义显然相对于政治与功利；“废物”的意象也提示着，个体在庞大的革命机器中运转磨损，最终只有报废一途，只有那些坚强的极少数能够避免这个命运，在政治斗争中得到滋养。同时又让人感到，知识分子投入革命，其价值正在于脆弱的身体和意志不断受到研磨的惨烈过程，报废也同样是一种悲壮，因为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只有

9 《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页199。

无产阶级革命才是历史的唯一正路，其他消费生命的形式都是没有价值的。

“废物”的感觉验证了某种政治无能，接着就是对“睡眠”、“休息”的渴望，只有“伟大的休息”可以结束自我改造而不成功的闹剧。“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致最细微的‘异己’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多余的话》所提示的文人的脆弱性质从侧面说明了自我改造的艰巨，从某种程度上说，具有这种脆弱性质的人只能像豆腐一样，被轻拿轻放，精心烹饪，才能成为“世界第一”的美味。或可以说，脆弱性格是自我意识极度发达的表现；而一切群众运动，包括革命，在心理上的动力却是自我感的匮乏，以及投身某一神圣序列以获取个体价值的冲动，二者之间的冲突和缠绕，构成了现代知识分子基本的生存境遇。